

# 世人争相说《聊斋》 几人闻知《耳梦录》

蒲松龄的好友张贞也写过一部文言小说,名声为何远逊?

《渠丘耳梦录》(简称《耳梦录》)是清初山东著名文人张贞撰写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,现藏于安丘市博物馆。从体裁、笔法各方面看,与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(简称《聊斋》)非常相像。《耳梦录》,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(1709);《聊斋》在蒲松龄生前已有抄本传世,乾隆十六年(1751)铸雪斋抄本是今存最早的一种。拿最早年代的《聊斋》抄本与《耳梦录》刻本比较,《聊斋》晚了42年。但按各自序言题识年份,蒲松龄又比张贞早30年。两部小说都是写鬼写妖,《耳梦录》成书又早,后来却难以与《聊斋》互相媲美。个中缘由,值得一说。



张贞画像

清康熙刻本《渠丘耳梦录》

□张漱耳

## 张公蒲公互相倾慕

《耳梦录》的作者张贞,字起元,号杞园,又号渠亭山人。是一位集儒学、文史经学和书画篆刻艺术于一身的博学鸿儒,与当时顾炎武齐名,有“南顾北张”之誉。他1636年生人,年长蒲松龄5岁。俩人都是生在明末,长在清初。蒲松龄毕生热衷功名,自19年初应童子试后,便屡试不第。直到71岁时才援例出贡,5年后便去世。张贞在康熙二十四年(1685)49岁时举博学鸿儒,诏试太和殿,御试第三名,授翰林院孔目,复征拜待诏,皆辞不赴任。可见,蒲松龄除了有部《聊斋》,从封建科举及其他艺术才能衡量,张公压蒲公一头。为了说明问题,不必方方面面列举对比了,说说俩人首次见面的情景,就明了了。

两位老先生是康熙四十年(1702)相识。是年初夏,张贞在济南造访挚友吴琯府上时,吴琯之子吴木欣引见张贞结识了吴的外甥、诗人朱细。朱细偶识张贞后仅数日,便盛邀他参加一个家筵。筵席上,张贞与蒲松龄首度碰面。原来,时蒲松龄早已是朱细的知音,三月份他来济南参加科举乡试,就住朱细家里,得到安排照顾。试毕朱细在大明湖摆了一桌,致两位老者相见。

蒲松龄虽与朱细结为契好,但毕竟他比朱细大了30岁。酒席之上,同代人的蒲、张一如故,二人高谈阔论,不住地倾心交谈,互有相见恨晚之意。甚至当着主人的面,都不乏指奸责佞、贬恶诛邪之语。这都难怪。张贞作为著名文人,学富五车,著作等身。尤其俩人都在写文言笔记小说,加上又有相似的际遇和身世,诸如都算“避世之士”,颇具狷介之气,性格耿直、愤世嫉俗……当然会有探讨不尽的话题。筵席间,张贞向蒲松龄出示自己去年才写的《明湖记》。结合现场实况,蒲松龄对文章所写的凄清意境,回味许久,觉得“余哀”缭绕。日暮分手归途中,因此次结识而兴奋得高一脚低一脚,几次滑倒泥泞路。回到寓所都意犹未尽,顾不得洗漱,一挥而就写成一首七言古风《朱主政

席中,得晤张杞园先生,依依援止,不觉日暮,归途放歌》。两天后,蒲松龄又写诗赞颂张贞潇洒出尘:“谁者肖作湖海人,将无似我老张君。簪笠犹沾绿江雪,奚囊尽括青山云。游仙欲把浮丘袖,笑我双瞳小如豆。髯兮髯兮游何之,布袜行缠从而后。”

## 两部小说颇多近似

《耳梦录》分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集,共收录安丘一地的奇闻逸事119篇。其中甲集28篇,乙集14篇,丙集28篇,丁集49篇。侧重史料,兼顾现实,基本囊括了古往今来流传渠丘的名胜古迹和名人逸事。史料部分从旧有的故事衍化而来;记述底层的平民百姓及状写鸡犬猪牛传闻(个别近乎荒诞)的现实素材来自百姓的口头传说,但是鲜有作者的亲身经历。这一点,不免令人遗憾。

本来,张贞绝意仕途后,和蒲松龄一样,长期生活在农村,应该有机会接触农民,体察他们的疾苦。对封建社会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对底层百姓的压迫,以及自然灾害的袭扰,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。蒲松龄就自称《聊斋》是“孤愤之书”,《耳梦录》系乡里琐言、传闻逸事,必然反映农民的疾苦才是,可惜没有。偶尔有,也是间接涉及。如丙集《张命长》中,起首的“山翁恣大师曰,孝子张命长,山东安丘人也。壮为县吏,任侠,睹诸吏受賕多不法,知吏不可为,则弃刀笔归耕垅亩……”好在对自然灾害暴露出来。对官场的黑暗,当局的昏庸,官匪的勾结,都不去冒犯揭露。为什么不能与蒲松龄一样?盖因两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。张贞有科举并授官的经历(儿子也考中举人),中举比蒲松龄早,且每步都是一次通关。虽然归隐杞园,但名分在那里,还享受着封建统治阶级对举人的待遇,比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高出很多。你想,一点都没有切肤之痛之人,怎么会对科举制度予以批判?又怎么能站在人民立场上写出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呢?

文学创作如《红楼梦》之曹雪芹,如《聊斋》之蒲松龄,没有恶劣的境遇,即便立意很好,才分很好,他也写不出能够立世的不朽之作。

次琐闻,井然简洁;而《训儿小说》《张玉伦》《画衣》,都是1500字左右;文言翻译成白话,都是情节生动曲折的短篇小说。丁集《赤蛇精》也有600字左右,所述志怪变化,如在目前,也不能与小小小说同日而语。在借鉴继承史传文学传统方面,形成了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和风格。

## 《耳梦录》的局限与不足

这样一本如此有近似度的古籍,却不能媲美《聊斋》,其社会影响、文学成就后来与《聊斋》拉开了距离。

原因有两大所限。一地之限和境遇之限。

本来,论社会影响,写鬼写妖他要先于蒲松龄,但119的篇幅又怎能与431篇可比?相差如此之大,盖因被“渠丘”限住了。他记得是一个县的奇闻逸事,试想,明末清初,渠丘能有多少人口?据安丘县志载,明万历十七年(1589)仅有19174户,46767人。明崇祯十五年(1642)后,战事不断,瘟疫流行,灾害饥荒加剧,不少地方十室九空。逢王一带(张贞隐居之乡)人烟几户灭绝。清康熙后,才见逃亡者回归。稀少的人间烟火,能产生多少有意义的故事?而《聊斋》就不一样了,人家那是放眼了大半个中国。

再说境遇。众所周知,蒲老先生是借花妖狐魅的故事来揭露社会黑暗,予以鞭挞和嘲讽。张贞对民间疾苦,仅是同情而已,至多把自然灾害暴露出来。对官场的黑暗,当局的昏庸,官匪的勾结,都不去冒犯揭露。为什么不能与蒲松龄一样?盖因两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。张贞有科举并授官的经历(儿子也考中举人),中举比蒲松龄早,且每步都是一次通关。虽然归隐杞园,但名分在那里,还享受着封建统治阶级对举人的待遇,比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高出很多。你想,一点都没有切肤之痛之人,怎么会对科举制度予以批判?又怎么能站在人民立场上写出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呢?

文学创作如《红楼梦》之曹雪芹,如《聊斋》之蒲松龄,没有恶劣的境遇,即便立意很好,才分很好,他也写不出能够立世的不朽之作。

□雍坚

“济水自西南蜿蜒而下,其色碧且清,附城两岸多菜圃,王瓜坠地可折数断,土性之肥美可想矣。一时之达官富绅,名园别墅多卜地河畔。杨柳茂密如结翠幄,往来歌声与鸟语错杂如笙簧。桥亘东西如驾彩虹。登桥远眺,见东南诸峰罗列如张翠屏,有山拔起,疑与天齐者,泰岱也……”这是民国四年(1915)齐河县知事吴福森所写《大清桥沿革记并序》中的一段怀古之作。

吴福森没有见过大清河,也没有见过“其色碧且清”的济水(大清河)。在他写作此文前的60年——1855年,黄河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海,位于济南府长清县北店村(今槐荫区吴家堡街道北店子村)与齐河县城(今齐河县祝阿镇)间的大清桥被滚滚洪水冲毁。大清桥地当九省通衢要冲,旧时官舆商辇、贩夫走卒来往不绝。清代康熙、乾隆下江南,也多次从此桥经过。

过去的大清河,水清且浅,河道也远没有黄河这么宽,济北两岸人民往来交通虽然也不是很方便,但尚有桥梁相通。由历城县、长清县的旧时辖区也可以看出,当年的大清河只是两县的一条过境内河。历城县在大清河北有清宁寺乡、马店乡等广大辖区,长清县在大清河北有济北乡、故河乡等广大辖区。

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后,交通阻断,水患频发。不仅西北岸的齐河人发出“良辰美景付浩渺,世上再无大清桥”之慨叹,济南人也整体失去了北出通衢,历城、长清等县仿佛被一分为二,河北岸辖区恍如“飞地”,县太爷想要去视察一下,也得事先看好天气再找船工摆渡,十分不便。

更让人担心的是,伴随着官堤民埝的逐年加高,黄河已经以地上河的形态“悬”于济南城北,对两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形成严重威胁。美国旅行家威廉·埃德加·盖洛清末曾来济南游历,他在1910年出版的《中国十八省府》一书中曾经写道:“这儿(济南)跟中国多数地方一样,人口稠密,而且都挤在黄河边上。罗德岛每平方英里400人,比利时每平方英里589人,而山东则是每平方英里680人,黄河沿岸每平方英里1700人。60年前,黄河改道350英里。新河道有1英里宽,50英尺深,原是大清河的河道。由于淤泥堆积,河工们在黄河新河道的两边筑起高坝,洪水期黄河水位竟高出平原20英尺。河工们不能无限地加高堤岸,他们承认,20年内必须找到新办法,否则黄河会再次改道。黄河两岸稠密的人口正等待着一场灭顶之灾,疏浚显然是个良方。”

(本文选自济南市档案馆编《照片里的黄河故事》一书,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,2022年11月出版)

## 大河横亘催生木船摆渡

——济南黄河故事⑦



清末冻口摆渡船。